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本身

——兼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

郭 广

摘 要: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是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方法的原则性问题: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三是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一书以这三个问题为基点,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点上做出了自己的解答,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整体风貌,真实切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本身。**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21 世纪以来,随着党中央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国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热潮。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备受国内学界关注,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与何萍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 年 3 月版,以下简称《研究》)无疑是这项研究中占据学术前沿的一部力作。该书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事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为进路,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三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清晰地展现了一幅从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90 余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浩瀚画卷。通篇拜读后,在笔者看来,《研究》以此三个重大理论问题为基点,真实地切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本身。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问题的解答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这些学者质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翻版,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外来哲学,在中国没有自身的土壤。这两个理由说到底就是否认中国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来,解答中国是否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就成为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提出,《研究》明确地提出了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论题,并从理论、历史和方法论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上阐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对质疑的两点理由进行了剖析,令人信服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支点揭

示出来。

在理论层面上,《研究》通过诠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涵,充分阐释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科学性、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它自身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理论形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一人的独白,而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本国的实践特征和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根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的特殊实际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它以独特的中国性格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是包含着丰富的特殊内容的普遍,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并且正因为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①

在历史层面上,《研究》通过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印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副本,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在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自觉创造的具有中国性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二十年就学习马克思主义了。”^②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自觉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特殊问题,赋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并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蕴含在两者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而是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理论创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皆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征选择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又并非列宁哲学传统的翻版,而是结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和概括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成果,……它有着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模本。”^③这种具有中国性格的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最终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在方法论层面上,《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历程和个性化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反思,又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的整体思索。那么,在方法上,就不应该运用逻辑主义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描述为一个单线条的传播过程,而是应该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将其表现为一个历经激烈论争和曲折探索、充满生机的创造过程。按照历史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就不再“以概念分析和概念的演变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是“把哲学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强调每一时代、各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哲学提问方式以及相应的哲学范畴体系和方法”^④。同时还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既“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图景中加以探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及其特征”,又“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地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⑤只有从这两个视角切入,我们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动历程,进而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①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15页。

③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63页。

④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48页。

⑤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50~52页。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的审视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来,如何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研究》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历史透视。

作为基于实践基础而寻求变革现实的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必须在其话语和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大众化。“离开了大众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转化为摧毁剥削制度的物质力量,也不可能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接受考验,总结经验,得到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①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曾一度被狭隘地理解为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通俗化表述,以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写成风趣而通俗的读本,就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研究》则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新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鲜明地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品格。”^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就是一个使中国大众掌握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则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及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保持开拓创新的理论呼唤和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最终旨归。因此,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统一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贴近中国实际、切入中国大众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才能在指导中国改革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应有的功效,同时也使自身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胡锦涛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是一句华丽的政治口号,而是一项历史性的未竟事业。《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个时期的一贯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创办的报刊中,在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论著中,在组织社团、创办夜校、口头宣传乃至提出标语口号等活动中都是面向大众的,都是做了大众化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都不是照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力图结合中国的实际和群众的需要,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⑤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办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报刊,比如《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等都尽可能采用通俗、浅显、口语化的语言,结合当时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现实生活,使马克思主义既准确完整又简明生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宣传阵地,中共早期中央报刊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和领头羊的作用”^⑥。同时,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和艾思奇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也在中国自觉地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和《伙友》周刊,向工人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瞿秋白作为在中国系统地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

①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38页。

②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4页。

③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40页。

④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⑤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4~5页。

⑥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197页。

人,先后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符合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的加工和改造。李达撰写的《现代社会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专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著作。他的《社会学大纲》以教科书形式全面、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理论,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除此之外,他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李达的这些工作不仅深化了中国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的性格,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道理转换成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哲理。这在中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走入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同他们的生活与斗争融合在一起。”^①更为典型的,是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以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范本。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中国性格。”^②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以上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联系中国的实际和切合大众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的创造性工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在不断推进这一实情,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三、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问题的呈现

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中,只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没有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由于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的缺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不仅在理论上单调贫乏,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思想的叙述上缺乏深刻的学理分析,致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成了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史,并非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③。然而,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进入20世纪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传播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首先在苏联,继而在中国等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情况就有了变化。一方面,党的领袖中有许多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就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事业,同时也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专业哲学家的相互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且越是往后发展,马克思主义专业哲学家的队伍越庞大,他们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④。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争夺革命政权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名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得到了普及与应用。而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需要广泛的宣传与普及,而且需要加以系统化和精细化,更加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难以承担诸种重任,一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队伍便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哲学思潮崛起于中国思想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为一个自觉的哲学运动,始自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①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334页。

②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428页。

③参见何萍:《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读〈陶德麟文集〉》,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④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6~7页。

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大钊。”^①中国的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政权之前就艰辛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们始终关注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被最广大的中华民众所自觉掌握与运用。他们在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做出许多创造性的贡献，而且也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不研究这些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成就，我们既不可能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全貌，也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②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研究，把中国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贡献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从而大大拓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空间，为我们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搏开辟了崭新的视界。

正基于此，《研究》不仅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一脉相承的发展图式，更突出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入中国时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艾思奇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为此，《研究》还专设《李达、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一篇，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李达和艾思奇为范例，将他们的工作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大环境中加以研究，充分展示其思想的个性特征，全面揭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这无疑是《研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以对李达的哲学思想研究为例，《研究》重点突出了他两个方面的贡献。其一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通过分析李达在建党前后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还原》和《评第四国际》等文章，《研究》指出他对当时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的批判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巩固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同时还通过考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创办并主持人民出版社、主持平民女校与开展妇女工作、直接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等实际工作，展示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二是在1923年以后他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通过对其《社会学大纲》《现代社会学》等著作的深度耕犁，《研究》阐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和对唯物史观的多向度开展而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格，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出来。由对李达的哲学思想研究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与传播无疑离不开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劳动，只有将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环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全面呈现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才能体现所有的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撰写只有吸纳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才会彻底摆脱革命领袖的“英雄史观”窘态，变得丰富完整且富有学理性。

总而言之，时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之源。马克思曾说：“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只有自觉介入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社会实践领域，不断地反思和解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才能推动自身的丰富发展和理论创新，永葆青春和活力。《研究》正是直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本身，树立了“中国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路向，澄明与解答了来自各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误解、曲解和诘难，全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定会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和深化的新导向、新动力。

●作者简介：郭 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下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6页。

②陶德麟、何 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第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